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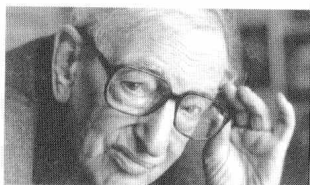
极端的年代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马凡 赵勇 李霞 余江涛 译 舒小昀 校

AGE OF EXTREMES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极端的年代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著
马凡 赵勇 李霞 余江涛 译 舒小昀 校

AGE OF EXTREME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极端的年代 / (英)霍布斯鲍姆(Hobsbawm, E.)著;
马凡等译.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214-06934-4

I. ①极… II. ①霍… ②马… III. ①世界史:近代
史—研究 ②世界史:现代史—研究 IV. ①K14 ②K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9355 号

Age of Extremes

First published in Great Britain by Michael Joseph 1994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bacus 1995

Reprinted 1995, 1996(three times),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Copyright © Eric Hobsbawm 1994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 2010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5-165

- | | |
|------|--|
| 书 名 | 极端的年代 |
| 著 者 |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
| 译 者 | 马 凡 赵 勇 李 霞 余江涛 等 |
| 责任编辑 | 刘沁秋 |
| 责任校对 | 李洪云 |
| 装帧设计 | 刘葶葶 |
| 责任监制 | 王列丹 |
| 出版发行 |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
| 网 址 | http://www.book-wind.com
http://jsrmcbs.tmall.com |
| 集团地址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
| 集团网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om |
| 经 销 |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960 mm×1 304 mm 1/32 |
| 印 张 | 21.375 插页 2 |
| 字 数 | 680 千字 |
| 版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214-06934-4 |
| 定 价 | 58.00 元 |
-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前言和致谢

人们可以(而且应该)仅凭掌握的二三手外部资料、人生经历的资料记载或者后代的史学家的著作,描写出一个众所周知的时代。但人们不可能仅凭上述资料描写出他或她的一生。正因为如此,人们不可能像描写其他时代的历史那样来描写 20 世纪的历史。我恰巧生活在本书所描写的这个历史时期,而且从十三四岁起到现在,我一直十分关注公共事务。也就是说,我不是以一个学者的眼光而是以一个同时代人的眼光在观察公共事务,从而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就是因为上述原因,在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当我戴着史学家这一职业桂冠时尽可能避免谈论 1914 年以来的历史,而在以其他身份出现时就并不讳言之。就像他们的行话所说,“我的时代”是指 19 世纪。尽管我在研究 20 世纪历史时并没有像为数众多的 20 世纪史学家那样拥有丰富的文献知识和档案,甚至连一丁点儿的档案资料都没有,但是我认为仍有条件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一下从 1914 年到苏联时代结束这一掐头去尾的 20 世纪。

当然,要独自一人、甚或以单种语言来了解现今世纪历史的编纂工作是完全不可能的。只有权威的古代史学家或拜占庭帝国的史学家才知道对于那些漫长的历史阶段该写些什么。然而,若以当代史学界对历

史知识的博学标准来衡量,我掌握的知识是非正式的和未成系统的。我做的大量工作是对文史知识特别是棘手的和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广泛的涉猎——比如,冷战历史或是 1930 年代的历史——即使在专家眼中本书所表达的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但这远不能使我满意。我当然尚未取得成功。在阐述一些问题时可能表现出无知和发表一些有争议的观点。

所以,本书是基于非均衡的基础,这点非同寻常。我多年来博览群书,同时因给社会研究新学院的研究生开设有关 20 世纪历史的讲座而进行了大量的阅读。在这过程中,我日渐积累起有关掐头去尾的 20 世纪的知识、记忆和观点。在相当多的国家中,像我这样的人,被社会人类学家称为“参与观察者”,或简单地称为睁大眼睛的旅行者,或被我的祖先们称为好管闲事者。这种经历的历史价值并不依是否亲身经历重大历史事件而定,也不在于是否认识甚或与历史伟人、政治家接触过。事实上,我以一个临时记者的身份到各个不同国家(主要在拉丁美洲)采访过总统或其他历史伟人,而这样的访谈往往徒劳无功。显而易见的原因是,这些人物所谈论的内容多数要考虑到公共媒体的传播影响。有启迪作用的访谈往往来自于那些可以并且想要自由发表言论的人,尤其是那些对于重大事件无需负责的人。尽管结识伟人和了解地方风情有时并非完全出于需要甚或会出现误导现象,但这种经历对我帮助巨大。这也许就像每隔 30 年的光景来看同一个城市——巴伦西亚或者巴勒莫——带回家的印象仅仅是当今世纪第三个 25 年间社会变化的速度和规模。有时我对相关内容进行记载并没有明确的理由,仅仅是将很久以前对话交流的内容储藏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如果史学家能够阐明 20 世纪一些历史问题的话,那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进行了观察和聆听。我希望通过这种研究方式将我所学到的知识奉献给读者。

在写书过程中,我力邀一些同事、学生和相关的人交谈来获取信息以充实本书。在写作中我受惠于许多人。论述“科学”的章节呈送给我的朋友结晶学家兼百科全书式学者、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艾伦·麦凯以及

约翰·麦道克斯审阅。我所写的关于经济发展的一些内容由我的同事兰斯·泰勒审阅。兰斯以前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现任教于新学院。更多有关经济发展的内容来源于我所阅读的论文和在各种宏观经济问题研讨会上全神贯注地聆听所获知的信息。宏观经济问题研讨会常由位于赫尔辛基的“联合国大学发展经济研究世界学会”举办,该学会当时已成为主要的国际研究中心,并在拉尔·贾雅瓦德拉博士的指导下开展研讨工作。通常,作为一名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的访问学者在那个令人景仰的机构度过的几个夏季对于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这个机构与最后几年的苏联有着接近之便,而且对这段时期的苏联有着学术上的关注。对于别人的建议我并不一概接受,甚至当从严格意义上讲自己的观点有问题时也是如此。学者们在会议上或对话时总是花费许多时间与他们的同事研讨,其最大目的在于从对方的思想中汲取知识信息,而我从这些场合中的确收获颇丰。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场合,我没法做到对我受益或纠正我观点的同僚们一一表示谢意,也无法对在新学院所教的一群特别的国际学生一一答谢,因为我有幸从这群学生那里获知了许多有用的知识。但是,我想我应该特别感谢费尔丹·厄尔加特和亚历克斯·朱拉两位,从他们的学期论文中我学到了关于土耳其革命、第三世界移民性质和社会迁移现象等知识。我亦十分感激我的学生玛格丽塔·基塞克所做的关于美洲人民革命联盟党和1932年秘鲁特鲁希略叛乱的博士论文提供给我的写作素材。

当20世纪史学家越接近现时代的编史工作时,他们便更加依赖于两种资料来源:日报或期刊和定期的报道;由国家政府和国际协会出版的有关经济问题等的民意调查、统计汇编资料以及其他类型出版物。显而易见,我从诸如《伦敦卫报》、《金融时报》和《纽约时报》等报纸中获得了相当多的信息资料。我还从联合国及其下属各类机构和世界银行价值颇高的出版物中获益匪浅,这些出版物均已列入书目。本书还应该提及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尽管它在实践方面归于失败,但其引领

潮流的《1945 年工业化和世界贸易》对经济方面作的精辟调查分析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它对我启发很大。如果没有上述这些资料来源,根本无法写出有关 20 世纪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历史。

书中除了明显属于我个人的见解外,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值得信赖。该书如果超负荷地附以大量的参考文献注解和标明博学的印记是没有意义的。我力争将参考资料限定在事实引文、统计和定量数据的原始资料范围内——不同的原始资料有时提供不同的数字——限定在对读者感到非同寻常、不太熟悉、预想不到的陈述和作者有争议的观点给予佐证的资料范围内。这些参考资料都置于正文的括号中。原始资料的完整标题罗列于本书的末尾。书目仅仅是正文中实际引用或提及的所有原始资料的完整目录。另有一本简短提示如何进一步阅读的书单独印刷成册。像这样的参考文献,注解与脚注基本上分开,脚注仅仅是进一步阐述或限定正文的内容。

不过,在这里还应当提及我所参考的一些书籍,向这些作者表达我由衷的谢意。我要特别感激以下两位朋友:经济历史学家和孜孜不倦的定量数据编辑者保罗·拜罗赫以及匈牙利科学院的前任院长伊凡·贝伦德,我从他们那里了解了“掐头去尾的 20 世纪”这一概念。就二战以来的世界政治历史而言,P. 卡尔沃科雷西的《自 1945 年以来的世界政治》是一本内容正确,有时候——可以理解的——是言辞尖刻的指南。对于二战的写作,我大量参考了阿兰·米尔沃德极为优秀的著作《1939 年—1945 年的战争、经济和社会》。在写作关于 1945 年之后的经济历史时,我发现赫尔曼·凡·德·威所写的《繁荣和动乱:1945 年—1980 年间的世界经济》以及菲利普·阿姆斯特朗·安德鲁·格林和约翰·哈里森所写的《1945 年以来的资本主义》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较之大多数缺乏热情的评论家所给予的评价,马丁·沃克所著《冷战》实应获得更多的赞誉。对于“二战以来左派的历史”这一章节的写作,我十分感谢伦敦大学的玛丽女王学院和威斯特菲尔德学院唐纳德·萨松博士的帮助。

唐纳德博士十分慷慨地让我了解了你对这一主题所进行的广泛且有深度的研究成果,这一研究迄今仍在进行。有关苏联历史的写作参考了莫舍·莱文、阿列克·诺维、R. W. 戴维斯和西拉·菲茨帕垂克的著作;有关中国的写作参考了本杰明·施华兹和斯图亚特·施拉姆的著作;有关穆斯林世界的写作参考了伊拉·拉皮德斯和尼基·凯第的著作。我对艺术的看法多数来源于约翰·威莱特论述魏玛文化的著作(以及他的谈话),同时也来源于弗兰西斯的著作。第六章内容的写作参考了林·加拉弗拉所著《加吉列夫》。

我要向帮助我筹划本书的人们表示感谢。首先,要感谢我的研究助理,伦敦的乔安娜·贝德福德和纽约的里斯·格兰德。尤其要感谢才华横溢的格兰德女士。如果没有她的帮助,我无法填补相当多的知识空白点,也无法核实那些模糊不清的事实和参考资料。我亦十分感谢帮我打印草稿的鲁丝·西耶斯。玛琳·霍布斯鲍姆以对当今世界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的视角兼学者的视角审阅了全书,对此我万分感谢。

我前面已提到还应感谢那些新学院的学生们,在给他们作的讲座中我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阐述。本书也献给他们。

20 世纪概览

12 个人对 20 世纪的看法：

以赛亚·伯林(英国哲学家)：“我个人在 20 世纪的生活经历中没有遭遇过磨难，但在我的记忆中，20 世纪在西方历史中是最可怕的世纪。”

福里奥·卡罗·巴罗贾(西班牙人类学家)：“在我个人的生活经历与 20 世纪的现实之间有着十分显著的对照：我平静、平安地度过了幼年、青年和老年；而人类却经历了许多可怕事件。”

普里莫·列维(意大利作家)：“我们这些集中营的幸存者并不是真正的见证人。对这一令人难过的观点我经历了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那是在看了其他幸存者所写的文章，以及几年后重温自己的作品时，才渐渐认同了这一观点。我们这些幸存者人数极少且与众不同。我们经由搪塞、技艺或幸运而生存，却永远没能见证真相。那些真正目睹法西斯暴虐的人们却永远逝去或只能无言地重返家园。”

雷纳·杜蒙(法国农学家、生态学家):“我认为整个世纪充斥着屠杀和战争。”

里塔·列维·蒙塔西尼(意大利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家):“20世纪尽管有诸多问题,但也有诸如革命、第四阶级的出现以及千百年来受压制妇女的解放等进步事件的发生。”

威廉·戈尔丁(英国诺贝尔奖获得者、作家):“我认为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充满暴力的世纪。”

恩斯特·贡布里希(英国艺术史家):“20世纪的主要特征是世界人口的可怕激增。这是大灾难,我们对此束手无策。”

耶胡迪·梅纽因(英国音乐家):“如果要总结20世纪的话,我认为它唤起了人类本应拥有的巨大期望,同时毁灭了人类的所有幻想和理想。”

塞维罗·奥乔亚(西班牙诺贝尔奖获得者、科学家):“20世纪最具特色的事件是科学的巨大进步。”

雷蒙·弗思(英国人类学家):“从技术层面看,我认为电子学的发展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展;从观念上看,20世纪的特征是:观察事物从相对理性的和科学的视角转变为非理性的和缺乏科学的视角。”

列奥·瓦里阿尼(意大利史学家):“20世纪的历史表明,正义和平等的理想的实现往往稍纵即逝,如果想一直拥有自由,我们必须重新奋斗……即使处于最绝望的境地,我们也不应绝望。”

弗兰科·文杜里(意大利史学家):“史学家无法回答这一问题。而我须努力再三才能理解 20 世纪。”

(Agosti and Borgese, 1992, pp. 42, 210, 154, 76, 4, 8, 204, 2, 62, 80, 140, 160.)

1

1992 年 6 月 28 日法国总统密特朗未经宣布即出人意料地突然造访萨拉热窝。该地区当时已成为巴尔干战役的中心,在以后的半年中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将喋血于此。密特朗总统此行的目的是想引起全世界对波斯尼亚危机严重性的关注。一位明显上了年纪、身体虚弱的著名政治家冒着炮火出现,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人们的敬仰。尽管密特朗造访的日期显然是一个中心问题,但人们实际上对此却未置评论。为什么总统选择这一特殊日子去萨拉热窝?那是因为 6 月 28 日是一次暗杀的纪念日。1914 年奥匈帝国大公弗朗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从而导致了几周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于密特朗时代受过教育的欧洲人来说,因政治性的错误和失算而仓促地将日期、地点和历史大灾难的纪念物之间相关联让他们有突兀之感。如何能够更好地戏剧性地揭示波斯尼亚危机潜在的隐含意义而不用通过选择一个象征性的日子呢?除了一些专业的史学家和十分年长的公民外,几乎没有其他人能够领悟到这一事件的隐喻。对历史事件的记忆已不复存在。

对过去历史的破坏,更确切地说,对将人们当前的经历与前辈们的经历联系起来的社会机制的破坏,是 20 世纪末期最典型和最怪诞的现象之一。世纪末成长起来的大多数年轻人生活在一种与既往的公共历史缺乏有机联系的状态中。这就使得以牢记他人遗忘之事为己任的史学家们在第二个千年之末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正因如此,他们

不但要做好汇编、记录、编辑等史学家的基础工作,还应肩负更多使命。1989年,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尤其是所有的外交部,如果它们召开一次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安排的讨论会,它们会从中获益的,但是它们明显是忘了这件事。

以掐头去尾的20世纪(1914—1991)为主题来讲述历史故事并不是本书的目的。人们都知道不能想当然地照字面去理解20世纪有关的基本历史知识,即使他们被聪明的美国学生问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词是否意味着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我的目的是去探究和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为什么这些事会牵扯在一起。对于生活在掐头去尾的20世纪的我的同龄人来说,理所当然可以写一部自传。我们谈论、阐述(和更正)自己的记忆。我们就像戏剧中的演员一样以各种方式在历史中扮演角色,以生活在特殊时代和地方的人的身份来谈论历史——然而我们的角色微不足道——仅仅是时代的观察者,当人们亲眼目睹一些重大事件从而形成对20世纪的看法时尤其如此。我们在20世纪中担当角色。20世纪是属于我们的。对于那些属于另外一个时代的读者,诸如在本书写作时期刚刚踏进大学校园的学生、越南战争相对于他们属史前史的人们,也不应该忘了这一点。

处于我们这个时代背景中的这一代史学家们,之所以不愿意看到过往的一切遭到破坏,不仅因为我们生活在以公众人物和事件来命名街道和公共场所的年代(战前布拉格的威尔逊车站,巴黎的斯大林格勒地铁),也不仅因为生活在不断签署和平条约而需加以区分(凡尔赛和约)和唤起战争记忆的年代,而且因为公共事件已融入我们的生活中。公共事件不只是我们个人生活的标志,同时也成为我们个人生活和公众生活的构成要素。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的独裁者那天,对于本书作者而言并不仅仅意味着生活中任意一天的到来,而且意味着一个重要生活场景的记忆:一个冬日下午,一位15岁少年与他的妹妹从位于魏尔默斯道夫邻近的学校向位于哈伦西的家走去的时候,在路上某个地

方,看到了这则头条新闻。直到现在我还能像做梦一样回忆起这一场景。

其实,不只是上了年纪的史学家将过往的一切融入其人生经历,世界各地的成人,无论其个人的生活背景和生活故事如何,都经历过相同的重大事件。这些阅历在某种程度上以相同方式给我们所有人都打上了烙印。1980 年代末走向分崩离析的世界格局是受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建立起来的。我们都受到过俄国革命的影响,比如说,由于我们习惯于以二元悖论来思考现代工业经济,因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相互排斥的事物,其一由苏联模式组织的经济作为鉴别标志,其余的均归为另一类。现在,人们已清楚认识到这种划分实际上是一种随意的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为的解释,而这种解释只能在一定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才能理解。然而,我在写作过程中,即使追溯以往历史,也难以找到比将美国、日本、瑞典、巴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韩国归为一类的粗略划分原则更为实际的划分原则。而且,苏联的国家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在 1980 年代以后即告崩溃,与此同时,位于相同地域的东亚和东南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制却依旧存在。

经历十月革命后依然存在的世界是这样一个世界,它的制度是由二战中的战胜方组建而成的。战败方或与之相关联的一切不仅退出喧嚣尘世,而且除了在好与恶相对的道德世界的戏剧中充当“敌人”角色外,不再载入史册,也不再与智慧生活结缘(尽管可能在程度上或持续时间上有所不同,但这种状况也正发生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冷战失败方身上)。这是生活在充满宗教战争的世纪中容易受到的惩罚之一。不容异端之说是它们的主要特征。就连那些宣扬他们自己的非意识形态的多元主义的人们也认为,对于相互对立的现世宗教来说,这个世界还不足以给它们提供永久共存的环境。20 世纪接连不断的宗教或意识形态的冲突给史学家们的研究设置了诸多障碍。进行评价已不是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要弄懂那些对于我们来讲几乎不能理解的事

情。在理解方面存在的问题不仅有强烈的信念,还有形成这些信念的历史经验。要克服第一方面的问题比较容易,因为人们熟悉但观念错误的法文成语“理解一切就是宽恕一切”并不符合事实。联系德国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其历史上的纳粹时代并不意味着可以宽恕种族灭绝和屠杀行径。在任何情况下,生活在这一非凡世纪中的人们都不可能放弃评判。要想理解历史现象谈何容易。

2

回顾掐头去尾的 20 世纪,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苏联解体这一段历史,我们发现它已形成了一个连贯的历史时期,那么如何才能对这段历史有个清楚的认识呢? 尽管可以肯定掐头去尾的 20 世纪对将来会有很大影响,但我们并不清楚将来会发生什么,第三个千年又会是什么样。然而,毋庸置疑的是,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初是世界历史上旧时代结束和新时代诞生的时期。这对于 20 世纪的史学家来说是个重要信息,因为虽然他们可以根据对过去历史的认识来预测将来,但是,他们的营生毕竟不是为赛马提供内部消息。他们可以报告和分析的仅仅是已经获胜或淘汰出局的赛马情况。现实状况是,无论预言者的专业资质如何,在过去的 30 年或 40 年间他们的预言工作却相当糟糕,只有政府和经济研究机构依然装作对预言充满自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预言情况变得更为糟糕。

本书所描述的掐头去尾的 20 世纪的结构看上去就像三张相连的图画或历史的夹心面包。从 1914 年灾难开始到二战结束后一段时期,紧接着是 25 年或 30 年经济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的巨大变革时期。这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回顾历史,这应是一段黄金时代,而岁月如梭,这一时代很快于 1970 年代早期宣告结束。20 世纪的最近几十年是发生分裂、易变和灾难性危机的

新时代。这一特征在非洲、苏联和欧洲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等世界许多地区有明显的体现。1980 年代向 1990 年代更替之际,人们反省过去、思考未来,心情变得越来越“世纪末的”阴郁。从 1990 年代的有利情况看,掐头去尾的 20 世纪经历了一段不长的黄金时代,正从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进入另一个尚不可知的、存在疑问的和未必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未来世界。然而,正如史学家就“历史的终结”这一问题对那些形而上学的预测者适时提醒的那样,人类总有将来。关于历史唯一可以完全下定论的是:只要有人类社会存在,历史就将延续。

本书的论点是这样组织的。它以标志 19 世纪(西方)文明衰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起点。这种文明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经济;崇尚自由的法律和宪法;中产阶级居于统治阶层;科学的发展、知识和教育的普及、物质的繁荣和道德的进步都达到鼎盛;欧洲居于中心地位的确立,并成为科学、艺术、政治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经济已向外渗透,欧洲士兵已战胜和征服世界大部分地区;欧洲人口(包括大量不断外流的欧洲移民和其后裔)持续增长已达世界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欧洲的主要国家组成了世界政治体系。^①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几十年是社会的大灾难时期。社会磕磕绊绊地经历了一个灾难又一个灾难,这样的情况持续了 40 年。有一段时期甚至连聪明的保守派都不敢打赌这个世界是否还能幸免于难。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后续的两全球性叛乱和革命浪潮使整个世界混乱不堪,并直接导致了历史上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产生。起初,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面积占全球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帝国的年代及其之前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殖民帝国受到沉重打击而

① 我在“连头带尾的 19 世纪”(从 1780 年代到 1914 年)三卷历史书中努力描绘和解释这种文明的兴起,也试图分析其衰败的原因。正文叙述中会提及下列几卷:《革命的年代,1789 年—1848 年》、《资本的年代:1848 年—1875 年》、《帝国的年代:1875 年—1914 年》。

土崩瓦解。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去世时如此稳固而拥有自信的现代帝制，其整个历史延续时间尚不及一个人的一生——那就是，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的一生。

即使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也没能抵挡住极其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全球经济危机还颠覆了标志着 19 世纪自由资本主义辉煌成就的单一全球经济。事实上，全球的实际经济状况比上述更糟。远离战争和革命，处于安全环境中的美国经济似乎也离崩溃不远。1917 年—1942 年间，当经济濒临崩溃的时候，标榜自由的民主政治制度除了在欧洲、北美和澳大拉西亚的少部分地区尚且存在外，其余全都消失了。而法西斯主义及其以独裁为特征的统治和政体却逐步确立起来。

只有自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了战胜共同的敌人而组成的临时而奇怪的联盟拯救了民主政治，因为红军在根本上赢得，并且是唯一可能赢得了对纳粹德国战争的最终胜利。从各种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组成反法西斯联盟的这一时期——确切地说是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构成了 20 世纪历史及其决定性时刻的关键点。除了反法西斯战争这一时期，就 20 世纪大多数时间而言，处于无法协调的对立状态中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一直是历史上相互矛盾的双方。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俄国帝制经济运行情况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经济运行情况相对照可以看出（Gatrell/Harrison, 1993），苏联战胜希特勒是十月革命所创设的政体取得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的胜利，现今的西方世界（除了美国）很可能由一系列独裁和法西斯主义居于统治地位的国家所组成，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由自由主义议会政体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所组成。这一令人无法理解的世纪充满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其一就是以推翻全球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十月革命最为持久的成效，居然是在战争时期和和平年代都拯救了它的敌人——也就是说，通过给予它的对手以刺激和恐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自身改革，并通过确立经济计划的声誉，给予它的对手改革的方法。

而且,甚至当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并且刚刚——幸免于经济衰退、法西斯主义和战争三方面的挑战,它似乎还要面对使苏联重整旗鼓的全球革命浪潮,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以一个超级大国的姿态出现于西方各国面前。

然而,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挑战往往针对其对手的薄弱环节。如果没有 19 世纪大灾难时期中产阶级的衰败,就不可能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的诞生。在沙皇俄国遭受破坏的欧亚大陆农业经济的薄弱基础上临时构建的冠以社会主义名义的经济体系,无论其本身还是其他方面,都未被视作资本主义经济全球范围内的现实的替代物。正是 1930 年代大萧条使苏联呈现为这种替代物的状况,就像法西斯的挑战使苏联成为希特勒战败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进而它成为了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它与敌对国家之间的对抗在掐头去尾的 20 世纪下半叶一直起着支配和威胁的作用,同时——正如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在许多方面稳定了全球政治格局。苏联在 20 世纪中叶的 15 年间都没有意识到其处于由三分之一世界人口所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首脑位置,其经济发展暂时看起来似乎超越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令人惊讶的态势迅速进入前所未有的非同寻常的黄金时代(1947—1973)。20 世纪史学家不得不思考的主要问题是:资本主义究竟为什么能够又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对此问题的解答尚无一致意见,我也无法提供有说服力的答案。也许要等到鸟瞰 20 世纪后半叶整个“绵长的浪潮”时才能得到令人更为信服的分析结果,可是,虽然我们回顾历史时将黄金时代视为一个整体,但直到本书写作之时,黄金时代以来世界所经历的危机时期仍未结束。然而,可以充满信心地下定论的是,黄金时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变革的惊人规模和非凡影响是有史以来最为巨大、最为迅猛和最为根本的。关于黄金时代各方面的情况将在本书的第二部分进行阐述。生活在第三个千年研究 20 世纪的史学家们很可能会看到这个令人称奇的时代给历史带